



言子的经历、思想和功绩

周文晓

言子是常熟历史上影响久远、贡献巨大的名人，也是历代封建帝王授衔赠爵最高、最多的一个常熟人。他配祀孔庙，列为“十哲”第九人。先后赠封为吴侯、丹阳公、吴公、吴国公等。他是“道启东南”“吴开文会”的南方夫子，是吴地思想文化的奠基人。他不仅是国家级的名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级名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印度、日本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四百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这些学院与学堂每天除了教授中文以外，都要介绍孔子和包括言子在内的孔子几个得意门生。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为我们研究言子提供了极好的机遇，而对言子的深入研究、正确评价和广泛宣传，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常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拟就言子的经历、思想与功绩作如下探索：



言子的经历、思想和功绩

一、言子的经历

言子主要的经历，大体可分 4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青少年言子，勤奋好学，目睹吴国战乱不断，立志救国而求





道。言子出生于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 506 年),距今 2520 年,言子家住虞山东里许,如今为常熟古城东言子巷,是言家第三位资质聪颖的男婴。言子家庭世守“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传统风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十分本分的农户。关于言子的籍属,历史上有过争论,《史记》称其为吴人。至三国时,当时著名的经学家王肃在《孔子家语》中把言子说成是鲁人,于是吴人与鲁人之争持续了数百年。后来南朝齐(479-502 年)陆道瞻的《吴郡记》、南朝梁陈间学者顾野王(519-581 年)的《舆地志》,因海虞古城中有言子故宅及宅内有洗衣石等故物,称言子是吴地常熟人。到唐代,更有唐林宝《元和姓纂》、陆广微的《吴地记》、司马贞的《史记索隐》等都以常熟言迹为证据,驳斥鲁人说。至宋代,理学家朱熹应学生——时任常熟县令孙应时之请,写成了《平江府常熟县丹阳公祠堂记》一文,此文中有这么一段论述:“平江府常熟县丹阳公祠者,孔门高等弟子言偃子游之祠也。按太史公记,孔门诸子多东州之士,独公为吴人。而此县有巷名‘子游’,有桥名‘文学’,相传至今。《图论》又言,公之故宅在县西北,而旧井存焉。则今虽不复可见,而公为此县之人,盖不诬矣!”朱熹的文章论定了言子应是常熟人,基本结束了言子籍贯的争论。

言子出生时的常熟属吴国北境,当时吴王阖闾由于任用了贤才良将伍子胥和孙武,安邦治国,讲文修武,国力雄厚,于是就想“兴霸成王”,史称北摄齐鲁,西破强楚。就





在言子出生那年,吴王伐楚,经5次战斗,吴军直捣楚国国都郢,大胜而归,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言子生长在乱世之中,父母期望早日结束战争,过和平安宁的生活,所以给他起名偃,寓偃武修文之义。言子11岁,族人开始教读,20岁举行冠礼,取名子游,并于年底结婚,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公元前485年至前479年,言子离乡背井,北学孔门,成为孔子得意门生。言子不顾新婚燕尔,不顾路途遥远,为了求救国之道,于20岁那年,到鲁国求学。他到鲁国时,孔子早在13年前带了弟子周游列国,当时孔子正在卫国。于是言子兼程苦行几百里路,赶到卫国都城帝丘(现为河南濮阳)拜孔子为师,入文学之列。

第三阶段是公元前479年至前471年,任武城宰9年之久,以“弘歌之治”践行孔子的礼乐治国之道。

第四阶段是公元前470年至公元前443年,言子传道讲学,成为继孔子之后儒家的一代大师。这一阶段,前后27年,包括在中原楚国、卫国、鲁国、陈国、晋国等传道讲学,以及在吴越地区传道讲学,单是吴越一带有弟子千计。

言子晚年带着孙儿言丰返回家乡,受到家乡和周边地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据《言氏家乘》称:“故吴逸民,闻讯向学,从之游者以千计”,使“孔子之道渐于吴,吴俗乃大变”,至今常熟周围的许多地方都有人们纪念、缅怀言子的记载和遗迹。据《奉贤县志》记载,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冬,63岁的言子曾不顾年迈到青溪(奉贤)传道讲学,开设塾馆,招收弟子,用礼仪教化民风,遂





使奉贤形成“凡有弟子者,无不令其读书”的风气。青溪百姓为感念言子的恩德,奉言子为“贤人”,清雍正四年(1726年),正式设立奉贤县。后人还在奉贤城镇建造了言子专祠。

二、言子的思想和功绩

言子有勤学好问、善于思考、穷根究底的治学精神,有经世救国、勇于实践的思想意识,有爱民重才,重本轻末的治国理念,所以他能成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和传人之一。

孔子曾经说“吾门有偃,吾道其南”(清费崇朱《孔子门人考》)。言子最终成为孔子“礼治”“仁政”“大同小康之治”思想的积极传播者。他的影响也很大,正如日本著名学者井上靖说的,“孔子伟大,子游也伟大。”

下面我从6个方面来讲言子的思想和功绩。

(一)救国求道,求知救国,发扬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爱国爱民的思想

言子北学孔门,其目的是要找到一条救国安民之道,他在拜孔子为师后,从孔子那里学到了礼治、仁政之道。言子联系吴国国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识到礼治在治国中的作用,所谓“礼之所至,众之所治也”。礼在治国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以仁爱为核心的人本哲学,也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言子认为吴国的君王如能以礼治国,能在施惠于民的同时注意对人民给以德的教育;如果不穷兵黩武,与邻国友好相处,就不会给人民带来战争灾难,也不会因此而被越国灭亡。历史上的吴越





之争,先是吴灭越,后是越灭吴,连年征战,造成“民疲士苦,道死巷哭”的凄象。如越军进攻阖闾城,史称“星散九重门,血洗十二街”。吴王夫差及残部逃到余杭山,全军覆没,吴王自杀,吴国至此共传 25 君,吴国存在 650 年后灭亡。此后言子辞官素服,守母国之丧。言子的这些行动继承和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民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光辉传统,影响着历代中国儒人学子和广大人民。无论是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还是封建统治阶级丧权辱国之时,很多爱国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为谋求人民的利益探索着救国之道,他们或浴血奋战于疆场,或组织革命运动,或倡言革新变法,涌现了无数爱国主义志士,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爱国者响亮的口号和共同的心声。

(二)以“弘歌之治”倡导了教育重本,贵在育人、重教尊仕的思想,弘扬了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言子在鲁国任武城宰,前后 9 年,治理一方行政,他所采用的是彪炳千古的“弘歌之治”,《周礼》有这方面的注释,“弘,谓琴瑟也,歌,依咏诗也”,这就是说,歌诗依琴瑟而咏之,即为弦歌。古人将没有伴奏的徒歌称为“谣”,以与有伴奏的歌相区别,而当时所歌的歌词即诗,就是已经收集于《诗经》中的诗。《周礼·春官》有称:“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又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





兴、道、讽、诵、言、语”。《诗经》中的诗当时是作为学校教材之用的,在教学过程中要求掌教的大司乐通过歌词培养学生忠和、祗敬、有常、孝友的思想,而且当时在具体教学中还伴以舞蹈。正如《毛诗》中所说的:“古人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弘之、舞之”。由此可见,弦歌之治即是指上述的弘歌教育,是具有德育、智育、音乐和体育等方面的教育。言子在武城进行的这种教育从教育对象而言,不仅包括青少年,而且还包括社会上已取得官职的“君子”和民间的成年百姓。《论语·正义》中讲到,春秋时庠塾之教废,故礼乐崩坏,雅颂之音不作,子游宰武城,乃始复庠塾之教,于是学者众。他在武城倡导的是君子、小人都有学道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是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所以,言子是理所当然的教育家。言子还特别重视德育教育,这可从他回答孔子的一句话中看出,孔子在武城闻弦歌之声,形莞尔之笑,曰:“割鸡焉用刀。”言子当即回答老师:“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言子的回答把“弦歌”与“道”相结合,意思是统治者通过学道做到爱人,而被统治者通过学道明确自己的义务职分,这样就“易使”,即容易治理。孔子听了对弟子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意思说言子讲得很对,我刚才说的是一句戏言。言子在武城9年,使武城得以百废俱兴,达到庶、富、教的小康之治,不仅武城人民永志不忘,而且为当时和以后的当政者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治理经验。被人誉为“百世之治





谱”，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关于“孝”必“敬”的思想

人们说到子女对父母的“孝”往往称“孝敬”，如“要孝敬爷娘”。“孝”是自古以来人们立身处世的重要道德标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素有“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之说，儒家主张“慎终追远，以孝立身，以孝齐家，以孝治国平天下。”在《论语·为政》中，有孟懿子、孟武伯、子夏、子游等四个弟子向孔子“问孝”的记述。孔子在回答子游问孝时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所谓能养，就是以饮食供养父母，父母有事，能为之服其劳。但是，对犬马，人们也供养饮食，因此，如果对父母不敬，而仅仅是供养饮食，那与养犬马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对父母真正的孝，必须以敬为先。所谓敬者，就是慎而敬肃，不怠慢，首先要在思想感情上尊敬父母。这当然对犬马无需这样。言子把孔子这一“孝”必“敬”的记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赋予了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四)育才、用人、重本贵德的思想

孔子“育人”，致力“身正”“尚德”“克己复礼”。言子对此不仅能承师说，而且有所发挥，他针对学友子夏花很大精力教门人弟子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等小的礼仪时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那么什么是本呢？言子认为“德者为本也”！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是最重要的,所以育人必须坚持重“本”之教,这也是言子几十年中传道讲学,全力从事“得人为本”“重本贵德”的教育思想的宗旨。

言子爱护人才,并积极使用人才。特别是他对澹台灭明的任用是最好的说明。澹台灭明,字子羽,他和言子都是孔子的同窗弟子。言子是爱国有志,品德高尚,学业超群;澹台灭明是有才有智,器量非凡,言必有信。澹台灭明欲事孔子,但孔子因澹台灭明“状貌甚恶”,不太喜欢,拒绝了,使之“既可修业,退而修行”。澹台灭明是武城人,言子在任武城宰时却没有嫌弃他,而是重用了澹台灭明,结果澹台灭明在帮助言子治理武城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孔子到武城去看言子时,问言子:“汝得人焉尔乎?”言子回答“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说澹台灭明品德端正,从不对上司溜须拍马,是一个道德高尚、正直无私的人。孔子对言子用人贵德的做法深为赞叹,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五)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

言子对孔子礼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他的《礼运》之作,与弟子子思等形成子游氏之儒,成为继孔子后儒家学说的一代宗师。康有为认为:“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他还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著名学者郭沫若也称:《礼运》一篇,毫无疑问,





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当代学者蒋伯潜也认为：《礼运》大同小康之说，可以见孔子之政治思想……疑即子游所记。

礼治思想是治理和维系国家政治生活运转的学问，所谓“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而且这种思想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中的开明君主所用以维持统治、施行德政的指导思想，封建统治者就是按这个思想“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正如孔子所说的治国而无礼等于瞎子，走路无人相帮，黑夜里没有灯光，那就漆黑一团。这种礼治思想与我们现在提出的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构建和谐社会也存在着十分相近的意义。孔子和言子所提出的礼治，归根结底是倡导德治，要求以仁义治理天下的仁政。强调每个人对他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以求造成维护社会的和谐秩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所谓大同小康，孔子早就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残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大道实行的时代，是以天下所共有的，人民选举贤能者共同治理，众心如一，相互合作，所以人们在社会上不独爱其所亲，不单施慈于儿女，更能普遍推广仁爱，使老者安享





天年,壮者各有贡献,儿童教育良好,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得到社会的供养。男子各尽职分,女子各有家庭,生活中不允许浪费物产资源,也不许把剩余物资占为己有,劳动中不许消极怠工,生产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所以人们竭诚相处,就不会有损人利己的阴谋,也不会出现抢夺偷盗行为。人们虽有门户可以不必关闭,那样的社会,就是大同世界。”孔子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在当时是一种理想世界,即使今天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个大同小康的理想之说却影响着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的“天下为公”,民族、民生、民权,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受这种大同小康之治思想的影响。我们今天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虽然在内涵上和孔子、言子提出的有所不同,但这种治理国家的思想之源,却与孔子、言子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就礼治思想而言,我认为孔子,博学善识,定一家之言;而言子总结、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六)与孔子其他弟子整理辑录了孔子的语录和事迹,编成《论语》

孔子去世后,言子和学友鲁人冉雍、卫人子夏等人整理了孔子的言论和事迹,辑成《论语》一书,这是儒家的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全书 20 篇 76 章,凡 12 700 余言,其中涉及孔子与门人谈“仁”的达一百余,还有八章为子游曰语,是言子阐述以“仁”为





中心的立“敬”、立“诚”的社会人伦之教,也是言子传播礼乐化教基本内核。《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与儒家的另外五部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称为《四书五经》,是封建思想的理论根据。《论语》也是士子为政的指南,是引导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性语录。它涉及到个人修养、治家、治国等理论,所以历代仕人学子都把《论语》作为必读之书。1987年,法国著名作家西蒙·莱斯在介绍他翻译的《论语》时说:“《论语》之外,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对这个世界大国产生过如此持久的影响”,而且“不抓住这个关键,就无法接触到中华文明。”《论语》既然如此重要,言子当然功不可没。

(本稿由苏州市社科联推荐)



周文晓,男,1938年7月出生,江苏常熟人,大专学历,江苏省地方志协会研究员,《常熟市志》副主编,《常熟年鉴》(1991-1998)总编,《常熟概况》总编。退休前为常熟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曾任江苏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苏州市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常熟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熟市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常熟市吴文化研究会虞山分会会长。长期从事党史地方志工作。编著有《翁同龢年谱》《朱剑芒先生纪念文集》《徐天啸与徐枕亚研究资料》《新编常熟史话》《史志耕耘录》等;参编有《中国楹联大辞典》《江苏省志·人物》《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综览》等十余部;先后发表各种史志论文60多篇。

